

“年轻老人”养老帮小的代际挤压与心理健康状况

李雄婧 杨立雄

【摘 要】文章基于代际均衡互惠理论以及角色积累理论,使用四代人的家庭分析框架,结合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2020 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分期 PSM-DID 模型,探讨了 60 至 75 岁的年轻老人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挤压显著降低心理健康水平;从边际影响来看,“仅养老”的年轻老人边际损害效应最大,“仅帮小”的年轻老人最小,“养老又帮小”的年轻老人在两者之间。照料了父母的年轻老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机制分析表明,代际挤压通过减少亲朋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增强主观老化来影响心理健康。此外,有养老金在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积极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积极老龄化、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年轻老人 角色积累理论 代际挤压 心理健康

【作 者】李雄婧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杨立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一、引 言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一老一小”的责任主体,生、养、教等功能多由家庭承担(杨菊华、何绍华,2014)。“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预期寿命延长与三孩政策实施,中国家庭的照料需求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8.4%的中老年人同时有健在父母和 16 岁以下孙辈需要照料^①,“四代同堂、儿孙绕膝”的家庭场景逐渐成为常态。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植着“家族绵延”情结和“责任伦理”规范,隔代照料与赡养父母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家庭规模缩减,育龄女性劳动力参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研究团队撰写的《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2019 年 6 月),见 <https://charls.pku.edu.cn/info/1010/1009.htm>。

与率提升,致使许多家庭将老与幼的照料任务叠加在已退休的年轻老人身上。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维度,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助于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学界关于代际关系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探讨颇为丰富,在向下的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隔代照料以及逆向反哺子女有利于心理健康(汪连杰,2022;赵建国等,2022)。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照料孙辈的频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唐丹等(2020)发现,偶尔照料孙辈的老年人相较于经常照料者,隔代照料对心理健康具有更为显著的正面作用。然而,余靖雯等(2023)持有不同观点,认为隔代照料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向上的代际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结论基本一致,即照料老年人的负担加重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袁笛、陈滔,2021;李放、饶丹,2023)。尽管如此,针对老年人承担养老责任的研究仍相对匮乏,陈亮(2018)通过个案研究法探讨了老年供养者在赡养高龄父母过程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与挑战。此外,Hans Härmäläinen 等(2021)的研究指出,同时承担养老与抚幼责任的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群体。但已有研究表明,向上与向下的照料负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叠加(Liu,2022)。

尽管学术界对老年人代际关系与心理健康进行了广泛探讨,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空巢老人或失能老人,对于照料负担较重的年轻老人关注不足;其次,在家庭代际关系的讨论中,赡养与抚幼往往被单独分析,或在“三代”框架下以中间代为视角进行讨论,而“四代”家庭研究框架中对年轻老人的讨论较为缺乏;最后,以往研究多采用代际团结论、代际交换论、代际剥削论等理论进行解释,对家庭政策和文化背景的考量不足。

鉴于此,本文以60至75岁的年轻老人为研究对象,基于“四代”家庭研究框架,采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集,以费孝通的代际均衡互惠理论为基础,结合角色积累理论,对年轻老人的家庭代际挤压和心理健康进行研究,试图厘清以下三个问题:(1)代际挤压如何影响年轻老人的心理健康?(2)代际挤压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心理健康?(3)在选择照料父母与帮助子女时,两类行为分别怎样影响心理健康?

二、理论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代际均衡互惠理论为基础,结合角色积累理论,可以阐释年轻老年人群中代际挤压现象的失衡状态,进而厘清其对个体心理健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中西文化在亲子关系上的差别时指出,中国的亲子关系遵循“反馈模式”,强调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育责任以及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赡养义务;相对地,西方亲子关系则遵循“接力模式”,侧重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

育。无论是“接力模式”还是“反馈模式”，这两种模式得以持续传承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均符合均衡互惠的原则（费孝通，1983）。简而言之，个体所给予的代际支持与所接受的代际支持之间应保持基本平衡，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是这种代际支持预期的生动体现。然而，隔代照料打破了这种均衡，导致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因隔代照料而经历重构（王海漪，2021）。此外，家庭生育子女数量锐减，在面临照顾赤字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倾向于优先照顾儿童，这种分配倾向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关系的失衡（钟晓慧、彭铭刚，2022）。

本研究将年轻老人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Gilly，1982）置于历史社会背景中，探讨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构性特征与阶段性变化。使用 2018～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研究对象为出生于 1945～1958 年的年轻老人。如图 1 所示，年轻老人一代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其父辈仍深受传统家庭宗族观念的影响；结婚后进入家庭扩展期，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子女数量显著减少，“大家长”权威趋于弱化，亲子关系的重心呈现出“恩往下流”的趋势；子女结婚离家后进入家庭收缩期，子女的生育决策经历了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宽，同时伴随着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子辈在家庭育儿方面的职能有所减弱；在丧偶后，家庭进入解体期，配偶间的相互照料功能丧失，个体的身体机能亦开始退化，此时子辈往往尚未达到退休年龄，而孙辈正处于婚育阶段，同样需要子辈的代际支持。由此可见，这一代年轻老人是既养老又帮小的奉献一代，也是未来进入高龄老年时期可能面临极大家庭照料缺口的一代。

虽然代际的互动生动复杂，上述分析或有简化，但仍可以基本判断：养老与帮小的叠加会对年轻老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目前学界尚缺乏养老与抚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性解释，因此有必要结合角色积累理论进行深入阐释。角色积累理论（Role Accumulation Theory）由塞缪尔·D·西伯（Sam D. Sieber）于 1974 年提出，其认为尽管多重角色可能导致压力和冲突，但亦能提供额外的资源、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等积极效应，因此多重角色并不必然导致负面结果。

为此，本文综合考察代际挤压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框架如图 2 所示。从角色反馈视角看，年轻老年人在赡养年迈父母时，因父母身体机能衰退易产生挫败感，从而增加抑郁风险；而在照顾孙辈或协助子女处理家务时，则可能体验到成长的喜悦与成就感，获得正向反馈与情感支持，这种积极的角色体验可能发挥保护作用。当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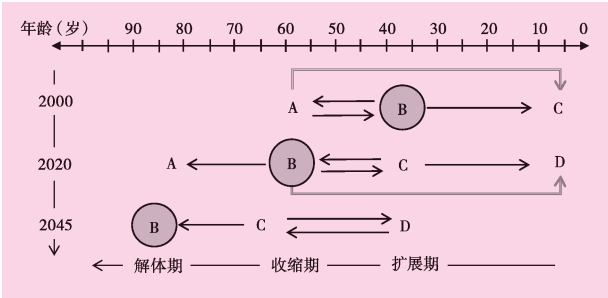


图 1 以“年轻老人”为轴心的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说明：B 代为年轻老人一代，A、C、D 为 B 的父辈、子辈和孙辈，根据初育年龄粗略切分时间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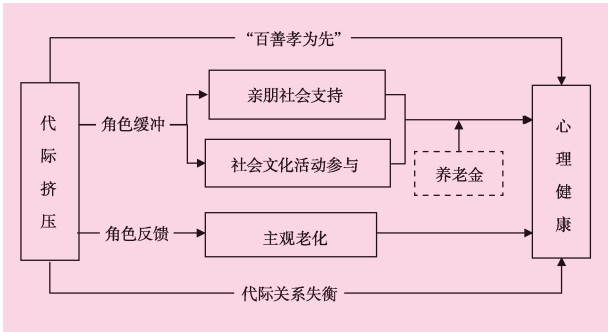


图 2 理论框架

类照料责任交叠时,正负效应互相影响,整体呈现双向负担,并在城乡间呈现出显著差异(Xu, 2019)。此外,照料资源在分配方向与性别上存在显著不对称,不同的分配结构可能导致照料者承受的心理压力与情绪体验存在差异(Liu, 2022)。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文化观念,

养老行为被视为个体履行家庭伦理与道德义务的重要途径。赡养老人不仅能强化自我认同,还能带来情感满足与心理成就感,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罗婷俐等, 2019)。若照料强度过高,养老角色反而可能挤占个体自身的时间与资源,增加心理负担(陈亮, 2018)。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1a: 代际挤压会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假设 1b: 在不同的照料模式下,该负面影响有显著差异;假设 1c: 在不考虑挤压强度的前提下,养老行为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从角色缓冲视角看,当个体在某一角色中承受较大压力时,来自其他角色的资源与支持可发挥替代性与补偿性作用,从而减轻负面心理效应(Sieber, 1974)。例如,养老金作为经济资本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谢贞发、杨思雨, 2022),亲朋好友给予的社会支持以及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所带来的角色认同作为社会资本,能提升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陈立新、姚远, 2005),从而缓解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2a: 养老金在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假设 2b: 代际挤压通过削弱社会支持和减少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源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设计,旨在全面深入地探究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生活现状、养老需求等多方面信息。CLASS 于 2014 年进行基线调查,之后每两年追踪一次,覆盖了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462 个村(居)。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法,依次对区县、村居、家庭户进行抽样。此数据集时效性较强、覆盖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全国代表性。

本研究聚焦于有实际养老行为(即每周照料父母时间超过零小时)或帮小行为(即每周协助子女处理家务及照料孙辈时间超过零小时)的 60 至 75 周岁的年轻老年人。此举基于两点考量:其一,75 岁以上老年人多数未处于家庭四代框架下的“夹心”状态,对其代际挤压的衡量存在偏差;其二,从个人生命历程视角看,75 岁以上老年人可能正处

于家庭结构解体的阶段,存在诸多难以观测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由于2018年前的CLASS数据中存在核心变量缺失的情况,本研究采用2018年与2020年两期的调查数据,选取两期调查中均处于60至75周岁之间且有追踪记录的个体,构成平衡面板数据。在剔除极端值样本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共计3416个,观测值6832条。

(二)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心理健康状况,主要通过抑郁评分进行量化。抑郁评分在问卷中使用针对中国老年人群修订的流行病学抑郁调查量表(CES-D9),该量表包含九个条目,采用三点计分法。在对两个反向计分条目进行调整后,抑郁量表最高分为27分,评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重、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代际挤压指数,综合考虑年轻老人在照料父母、照料孙辈及协助子女处理家务方面的客观时间投入,以及其在多重照料责任下的主观被挤压感受。与既有研究中将照料强度简单分为高强度和低强度相比,本研究尝试提出更具综合性的测量方式,以更准确地捕捉代际照料压力对心理健康的真实影响。具体来说,代际挤压指数由四个指标测量构成,对应问卷中的问题分别是“每周照顾父母或配偶父母小时数”“照顾父母感觉到困难吗?”“每周帮助子女育儿/家务小时数”“您觉得子女向您要求了过多的帮助和支持吗?”。本文在计算代际挤压指数时使用熵值法,以减少因主观偏误导致的权重误差(朱喜安、魏国栋,2015)。

为尽量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本研究借鉴了韩保庆、王胜今(2019)和汪连杰等(2022)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本研究的具体情境,选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家庭成员情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婚姻状况(已婚有配偶赋值为1,其余为0)、年龄、城乡(居住在城市赋值为1,农村为0)、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赋值为1,没有为0);经济状况变量包括是否有养老金(养老金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中的任何一种)、社会保障收入的对数值以及给子女的经济支持的对数值;家庭成员情况变量包括家庭同吃住人数、健在子女数量、子女婚姻健康状况(取所有子女婚姻健康状况的均值,子女已婚且和配偶居住赋值为1,其余为0)^①;身体健康变量包括自评健康状况(很健康、比较健康和一般赋值为1,比较不健康和不健康赋值为0)、慢性病数量。

3. 机制变量

本研究从社会关系和主观年龄感受两个方面进行机制检验。社会关系部分包括亲

^① 以均值衡量家庭内所有子女婚姻状况,取值越高代表家庭中婚姻关系稳定的子女比例越高。

朋好友的社会支持强度和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前者根据问卷“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部分的六个问题赋值并加总得到,涵盖了来自亲属和朋友的支持情况以及互动频率。后者则依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以下六类活动赋值:宗教活动、老年大学或培训课程、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听戏、唱歌/弹奏乐器、打麻将/下棋/打牌等、广场舞。若参加任一活动,赋值为1,否则为0。主观年龄感受通过问卷中“大多数时候,您觉得您的年龄是多少岁?”来衡量,高于实际年龄赋值为1,低于实际年龄赋值为0,用以反映主观年龄高估的情况。

(三) 模型设定

在探讨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时,需考虑大量不随时间变化且难以观测的个体特征(如性格特质),以及所有个体在同一时间段内共同面临的冲击(如社会环境变迁)。基于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式(1)所示:

$$Dep_{it} = \alpha + \beta Score_{it} + \delta X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受访个体和年份, Dep_{it} 表示年轻老人 i 在 t 年的抑郁评分, $Score_{it}$ 为代际挤压指数, X_{it} 为控制变量, α 为截距项, μ_i 和 γ_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进一步探究代际照料选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由于照料选择与个体及其家庭特征密不可分,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偏差;同时,养老或帮小的照料选择已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反事实结果并不存在。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选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该方法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使参与和未参与养老(或帮小)照料的年轻老人,除处理变量外,在其他特征上保持可比。

考虑到使用的是两期面板数据,参考谢申祥等(2021)的研究,采取逐期匹配策略,以减少样本跨期带来的时间趋势信息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尽管两期数据无法捕捉长期效应,但在数据可得性范围内,仍可较为稳健地估计“是否参与养老/帮小照料”对心理健康的短期影响,PSM-DID 的实施包括以下三步。

第一,计算倾向得分值。即在协变量条件下年轻老人参与养老(或帮小)照料的概率。具体而言,参考唐丹等(2020)的研究,选取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有无养老金)、健康特征(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数量)以及年轻老人家庭情况(子女数量、子女婚姻健康状况)作为预测照料行为的协变量。第二,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确保共同支撑与平稳性假设成立。第三,在匹配样本上计算平均处置效应(ATT)。

$$ATT_{PSM-DID} = E(Y_{20}^T - Y_{18}^T | X, D=1) = E(Y_{20}^C - Y_{18}^C | X, D=0) \quad (2)$$

式(2)中, Y 表示“参与养老/帮小照料”对抑郁评分的影响,下标 18 即 2018 年为初始期,下标 20 即 2020 年为干预期,上标 T 和 C 分别代表处理组和对照组。

表 1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年轻老人样本中,平均抑郁评分为 15.124 分,平均代际挤压指数为 0.618, 49.8%的个体为男性。年轻老人的平均年龄为 67.296 岁,受教育年限为 6.464 年,居住在城市的比例为 44.0%,已婚有配偶者比例为 81.3%。

四、主要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1. 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年轻老人群体中代际挤压现象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详见表 2。为确保分析的严谨性,本研究依据控制变量的不同特征维度,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依次纳入有相对变异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家庭成员情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变量作为控制因素,进而评估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模型 1 至 4 的结果显示,在纳入了各类控制变量之后,代际挤压对抑郁评分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这验证了研究假设中关于代际挤压强度的增加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基本结论,也与以往研究的发现(韩保庆等,2019;唐丹等,2020)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模型 4 在控制了身体健康维度变量后,回归系数由 4.924 降至 3.138,这一下降主要来源于自评健康,该指标作为一种主观健康感知指标,与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将其纳入模型后会吸收一部分解释力。虽然系数有所下降,但在控制了大量潜在混淆变量后,代际挤压对抑郁评分的影响仍保持统计显著性,说明代际挤压强度增加会显著损害年轻老人心理健康。

从控制变量来看,居住在城市、有宗教信仰、有养老金、社会保障收入、同吃住人数、子女婚姻健康状况、自评健康水平、慢性病数量均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有影响;而婚姻状况、年龄、给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健在子女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与韩保庆等(2019)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2. 养老与帮小的照料选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剖析,在不考虑代际挤压强度的前提下,养老和帮小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依赖于协变量平衡性与样本的共同支撑区域。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6832)

变 量	均值(标准差)
抑郁评分	15.124(3.315)
代际挤压	0.618(0.035)
性别(1=男,0=女)	0.498
婚姻状况(1=已婚有配偶,0=其他)	0.813
年龄	67.296(3.502)
受教育年限	6.464(3.854)
城乡(1=城市,0=农村)	0.440
宗教信仰(1=有,0=无)	0.064
养老金(1=有,0=无)	0.764
社会保障收入(元)的对数值	5.130(3.004)
给子女经济支持(元)的对数值	3.531(3.617)
同吃住人数	2.924(1.321)
健在子女数量	2.271(1.105)
子女婚姻健康状况	0.940(0.190)
自评健康状况	0.864(0.343)
慢性病数量	1.339(1.392)

注: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三位。

表 2 代际挤压对年轻老人抑郁评分的 TWFE 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代际挤压	4.310*** (1.562)	3.904** (1.569)	4.924*** (1.579)	3.138** (1.569)
婚姻状况	-0.170 (0.292)	-0.168 (0.291)	-0.176 (0.290)	-0.159 (0.284)
年龄	0.310 (0.351)	0.246 (0.351)	0.201 (0.349)	0.264 (0.343)
城乡	1.395** (0.599)	1.292** (0.598)	1.268** (0.595)	1.396*** (0.179)
宗教信仰	0.660*** (0.228)	0.733*** (0.228)	0.726*** (0.227)	0.871*** (0.226)
养老金		0.630*** (0.180)	0.669*** (0.180)	0.596*** (0.177)
社会保障收入的对数值		0.026** (0.012)	0.028** (0.012)	0.024** (0.012)
给子女经济支持的对数值		0.021 (0.016)	0.023 (0.016)	0.002 (0.016)
同吃住人数			-0.226*** (0.045)	-0.259*** (0.044)
健在子女数量			0.147 (0.455)	0.094 (0.447)
子女婚姻健康状况			0.465** (0.228)	0.578*** (0.224)
自评健康				-1.048*** (0.187)
慢性病数量				0.182*** (0.044)
常数项	-9.841 (23.530)	-5.909 (23.484)	-3.588 (23.411)	-4.410 (23.015)
观测值	6617	6617	6617	6611
R ²	0.015	0.023	0.032	0.07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本研究以有养老照料选择的样本为处理组，采用最近邻匹配进行分析。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缩小至 10%以内，组间差异经 t 检验均不显著，说明匹配有效地消除了选择性偏误，处理组与控制组在特征分布上高度一致。有养老选择的年轻老人样本在平衡性检验中效果较好^①。

图 3 绘制了匹配前后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分布，可观察到两期数据在匹配前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均存在较大差异，匹配后差异明显减小，再次验证了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分布的平衡性。

表 3 为养老和帮小的照料选择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的总体影响估计。其中模型 5 为最近邻匹配后进行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后发现，2018～2020 年间新增养老照料行为的年轻老人，其抑郁评分相较于一直没有养老照料行为的年轻老人显著降低 0.579 分。模型 6 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帮小的照料选择对于年轻老人的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

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传统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年轻老人普遍认同“百善孝为先”的孝道观念，视赡养父母为尽孝之举，从中获得自我认同与心理慰藉；而帮助子女则更多地被视为“奉献”而非“责任”，尤其是隔代照料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通常涉及

① 受版面限制，选择养老的样本匹配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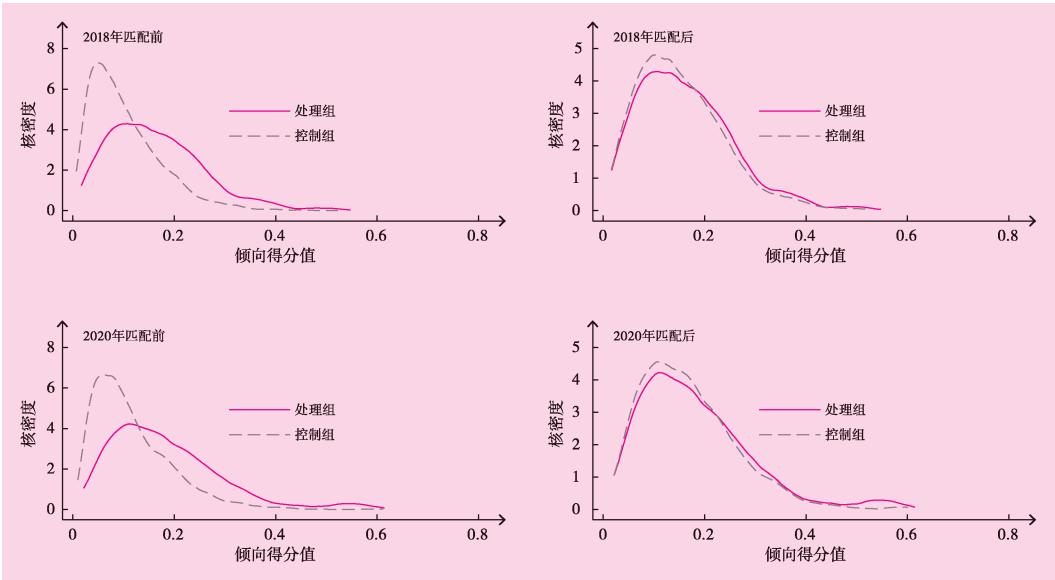


图 3 分期倾向得分匹配前后核密度分布

子女及其配偶双方家庭的共同决策。由于数据中缺乏对隔代照料决策涉及关键变量的观测,本研究未能发现帮小的照料选择对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综合分析表明,对于年轻老人而言,未能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可能引发内疚,但照顾孙辈的角色更多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即通常所说的“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因此,该角色的缺位并不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本质上看,其内在动因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

基准回归分析揭示了代际挤压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以及养老照料行为本身对心理健康的保护效应。表面上看,两个结论似乎存在张力,但实质上,它们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代际支持的双重性质:适度参与养老照料可能代表积极的社会角色实现,而高强度的照料参与则可能导致身心资源的耗竭。具体而言,养老行为契合儒家孝道规范,具有心理补偿作用;但父母健康衰退易使照料者感到挫败,从角色反馈视角看,可能加剧心理负担。

如图 4 所示,随代际挤压程度上升,“养老又帮小”群体的抑郁得分呈持续上升趋势,受影响最为显著;“仅帮小”群体整体得分偏高但波动较小;“仅养老”群体则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

表 3 养老与帮小的照料选择对年轻老人抑郁评分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5	模型 6
养老	-0.579*(0.282)	
帮小		0.159(0.243)
观测值	716	6675
R ²	0.409	0.06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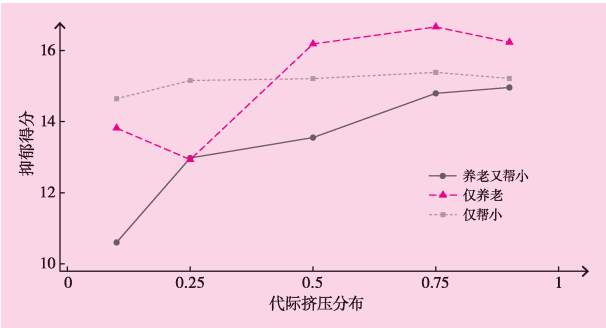


图 4 分照料模式代际挤压与抑郁评分分布

数,本部分将代际挤压指数的四个指标分别赋权 25%,重新计算代际挤压指数后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表 4 模型 7 结果显示,重构后的代际挤压指数提高 1 个单位,仍显著增加抑郁评分 1.158 分,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二是使用机器学习 XGBoost 方法。将数据集按照 80%和 20%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设定单棵决策树的最大深度为 5、步长为 0.1,梯度提升树的数量为 100,进行线性模型预测,最终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结果稳健。具体系数详见表 4 模型 8。

三是更换匹配方法。基准回归中使用分期最近邻匹配的方法为有养老行为的处理组匹配与之差异极小的控制组,为排除估计结果可能受特定的匹配方法的影响,本部分在表 5 模型 9 至模型 11 中分别替换为三种匹配方法:半径 0.01 的卡尺最近邻匹配、带宽 0.06 的核匹配方法、不分期的最近邻匹配。结果显示,三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5 基本一致,即养老的照料选择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该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代际挤压对抑郁评分影响的稳健性检验(N=6796)

变 量	模型 7	模型 8
代际挤压	1.158*** (0.309)	2.193** (1.0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不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不控制
R ²	0.065	0.042

注:同表 2。

表 5 养老选择对抑郁评分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 量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养老	-0.341* (0.208)	-0.191* (0.119)	-0.631** (0.335)
观测值	952	6794	1469
R ²	0.186	0.079	0.184

注:同表 3。

(二)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变量的测量方式、模型的设定以及样本匹配的方式可能带来估计偏差。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一是调整核心解释变量定义。基准回归中使用熵值法计算代际挤压指

四是工具变量法。养老照料行为与心理健康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除了通过多种匹配方法的 PSM-DID 缓解该问题外,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以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借鉴尹志超等(2019)的做法,选取受访者所在地区的平均代际挤压指数为工具变量。由于该变量剔除了本人代际挤压信息,因此不会影响本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根据表 6 结果所示,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对养老照料行为在 1%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所选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根据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有养老行为显著降低抑郁评分,与基准结论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此外,第二阶段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310.5,远大于 Stock-Yogo 的弱工具变量临界值,证实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三）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代际挤压显著提升抑郁评分从而损害心理健康,然而这种影响可能因群体特征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本部分选取不同照料选择的分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居住地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结果见表 7。模型 13 至模型 15 结果显示,不同的照料模式下代际挤压对抑郁评分的边际影响有较大差异,其中,仅养老的年轻人受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边际损害最大,仅帮小的最小,养老又帮小处于两者之间。

表 6 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 (2SLS) 估计结果 (N=6796)

变 量	工具变量法(模型 1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养老		-0.332 ^{**} (0.155)
工具变量	3.327 ^{***} (0.1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 ²	0.735	0.066

注:同表 2。

表 7 分人群代际挤压对年轻人抑郁评分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13 养老又帮小	模型 14 仅养老	模型 15 仅帮小	模型 16 女性	模型 17 男性	模型 18 已婚	模型 19 离婚/丧偶	模型 20 城市居住	模型 21 农村居住
代际挤压	7.635 ^{***} (2.205)	12.690 ^{***} (2.513)	2.334 [*] (1.332)	5.716 ^{***} (2.189)	-3.236 (2.267)	4.083 ^{**} (1.718)	-5.883 (4.102)	0.582 (2.107)	5.212 ^{**} (2.535)
观测值	541	208	5862	3311	3300	5395	1216	3728	2883
R ²	0.556	0.068	0.093	0.191	0.087	0.080	0.129	0.052	0.109

注:同表 3。

模型 16 和模型 17 报告了代际挤压对不同性别的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代际挤压显著增加女性群体抑郁评分,而对男性群体的影响不显著。这一差异符合中国传统性别分工特征——女性在家庭照料中承担更多实际责任,因此更易受代际挤压的负面影响。模型 18 和模型 19 结果显示,已婚的年轻人代际挤压显著提高抑郁评分,而在丧偶或离异的群体中不显著。已婚有配偶的年轻人往往同时面临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且社会与家庭对其角色有更高期待,因此更容易感受到代际挤压并表现出显著的心理健康损害;相比之下,丧偶或离异群体可能承担的照料任务相对较少,因而效应并不显著。模型 20 和模型 21 报告了居住地城乡分组回归结果,可以观察到代际挤

压对农村地区年轻老人心理健康的边际损害显著高于城市同龄群体。这一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农村地区公共照料服务资源配置不足,家庭内部的互助机制在代际支持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年轻老人通常无法通过市场或社区将照料责任部分转移,导致被挤压感更强;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在承担代际照料责任的同时,难以通过消费性休闲、文化活动等手段进行心理调适,自我调节能力较弱,进一步放大了代际挤压的负面影响。

(四) 机制检验

基于现有文献回顾及现实观察,本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传导机制:首先对代际挤压如何作用于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再对中介变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1.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能为年轻老人提供社交渠道,增进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亲友提供的社会支持能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对增进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李强,1998);与此同时,社会文化活动参与有助于年轻老人保持积极心态,提升社会融入感。基于此,本文选取亲戚朋友的社会支持、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度作为中介变量,探析代际挤压影响抑郁评分的具体路径。

如表8所示:模型22、模型24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代际挤压对老年人获得的亲朋社会支持、社会文化活动参与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模型23、模型25表明,亲朋社会支持、社会文化活动均对抑郁评分呈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年轻老年人在承担养老责任或协助子女时,繁重的代际照料责任挤占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导致其与亲戚、朋友之间社会交往的显著减少,社会文化活动参与不足。一定程度上来说,代际挤压占据了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时间空间,削弱了其社会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状态。

表8 社会关系的机制检验(N=6611)

变 量	亲朋社会支持强度 (模型 22)	抑郁评分 (模型 23)	社会文化活动参与 (模型 24)	抑郁评分 (模型 25)
代际挤压	-7.245*** (1.927)	5.564*** (1.158)	-0.242* (0.131)	6.105*** (1.158)
亲朋社会支持强度		-0.047*** (0.007)		
社会文化活动参与				-0.259*** (0.079)
R ²	0.042	0.075	0.095	0.067

注:同表3。

2. 主观年龄高估

年龄认同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体现为个体对自身年龄的认知。保持积极的年龄认知有助于个体获得正向情绪体验,减少焦虑、孤独等不良心理状况,对心理健康具有

保护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主观年龄高估作为中介变量。

如表 9 所示,代际挤压强化了个体的主观老化感知,降低自我价值感和心理韧性,从而显著提升抑郁风险。这表明,主观年龄高估是代际挤压影响心理健康的另一重要中介路径。

(五) 进一步分析

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增进老年人的健康福祉(邓大松、唐嘉梨,2021;谢贞发、杨思雨,2022),并减弱隔代抚养对心理健康的损害(余靖雯等,2023)。基于此,本文以是否有养老金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代际挤压与年轻老人心理健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 10 结果显示,养老金在代际挤压对年轻老人心理健康的负面效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领取养老金的年轻老人群体,其同等单位的照料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边际负面影响整体上远低于无养老金的年轻老人群体。从年轻老人个体层面来说,养老金作为一种经济资本能很好地给予其安全感;从家庭层面来说,养老金重构了代际照料的互动逻辑,使照料行为从传统的“交换属性”转向“情感与资源属性”。

表 9 主观年龄高估的机制检验(N=6611)

变 量	主观年龄高估(模型 26)	抑郁评分(模型 27)
代际挤压	0.345*(0.181)	6.159*** (1.169)
主观年龄高估		0.035*(0.021)
R ²	0.058	0.063

注:同表 3。

表 10 养老金的调节效应分析(N=6611)

变 量	养老金的调节效应(模型 28)
代际挤压	20.674*** (3.826)
养老金	13.446*** (2.525)
养老金×代际挤压	-20.939*** (4.056)
R ²	0.074

注:同表 3。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代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一部分刚步入退休阶段的年轻老人面临着养老与帮小的照料责任叠加,同时承载了家庭的“养老”和“抚幼”功能。这种责任叠加引发了代际关系的失衡,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潜在影响。本研究聚焦于该群体受到的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代际挤压显著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其中“仅养老”、女性以及已婚有配偶的年轻老人受到的边际损害效应更大;其次,有养老行为的年轻老人,相较于没有养老行为的年轻老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最后,代际挤压对没有养老金的年轻老人的心理健康的损害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代际挤压通过削弱亲朋的社会支持强度、减少社会文化活动参与及强化主观老化来影响心理健康。

本文补充了代际关系的研究视角,为四代家庭研究框架内代际挤压对心理健康影

响提供了实证支持。一方面,过重的照料负担,特别是养老负担,对年轻老人的心理健康不利,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帮助家庭完善照顾功能;另一方面,“养老”和“抚幼”不能脱离家庭,年轻老人在家庭中的照料角色对其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为当前养老和抚幼模式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也一定程度上对以往文献中的“代际团结论”“代际利益交换论”“代际剥削论”等进行了回应。尽管高强度的向上代际支持会损害心理健康,但养老行为可帮助年轻老人获得自我认同,对其心理健康有一定保护作用。这表明,仅仅从代际关系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二者间的复杂关联,还需要结合传统文化、社会变迁及代际均衡互惠逻辑加以分析。

本研究的相关发现具有以下政策意义。首先,需完善家庭支持与外部照护体系。要针对家庭在“养老”与“抚幼”中的现实需求,增强家庭功能韧性。在外部照护方面,应增加社区服务供给,发展居家可及、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改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其次,需缓解家庭代际照护的双重压力。在“上压”方面,应聚焦家庭养老的结构性矛盾,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展社区嵌入式、可负担的基本养老服务,形成对家庭照护的有效替代;在“下沉”方面,应健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提升父母一代的育儿责任与能力,减少隔代抚育依赖。第三,需提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持能力。在社会保障方面,应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与替代率,为家庭应对代际挤压提供基本经济保障;在就业政策方面,应探索弹性就业制度和家庭照料假等措施,减轻中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与家庭责任间的冲突。最后,需推动社会文化认知转型。应传播积极老龄观和家庭责任共享理念,倡导代际尊重与互惠,培育公平合理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氛围,构筑全龄友好的社会支持网络。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部分变量的测量仍有改进空间。第二,未能区分照料地点与自身居住地是否一致,因而无法准确评估下列两类情境的异质性:随子女异地照料,从而脱离原有熟人社会网络;非户籍地照料带来的制度性约束与生活不便。这些问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陈立新、姚远(2005):《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人口研究》,第4期。
2. 陈亮(2018):《“老人养老”中供养者的赡养压力分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2期。
3. 邓大松、唐嘉梨(2021):《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理论月刊》,第12期。
4.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5. 韩保庆、王胜今(2019):《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人口研究》,第4期。

6. 李放、饶丹(2023):《老年家庭照料者的压力与支持政策体系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第7期。
7. 李强(1998):《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
8. 罗婷俐等(2019):《老年人孝道观念中孝道期待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第7期。
9. 孙鹃娟、孙可心(2024):《家庭和社区环境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0. 唐丹等(2020):《照顾孙子女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人口研究》,第4期。
11. 汪连杰(2022):《促进还是抑制: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2. 王海漪(2021):《被照料的照料者:隔代照料与子代行孝互动研究》,《人口学刊》,第4期。
13. 谢申祥等(2021):《传统 PSM-DID 模型的改进与应用》,《统计研究》,第2期。
14. 谢贞发、杨思雨(202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15. 徐金燕、张倩倩(2023):《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追踪调查的发现》,《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6. 杨菊华、何绍华(2014):《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第2期。
17. 尹志超等(2019):《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第10期。
18. 余靖雯等(2023):《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经济学(季刊)》,第1期。
19. 袁笛、陈滔(2021):《生命历程视角下老年照料与女性健康》,《人口与发展》,第3期。
20. 岳经纶、范昕(2018):《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21. 张浩森、谭洪(2024):《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理论逻辑、现实需求与优化策略》,《学术论坛》,第4期。
22. 赵建国等(2022):《“逆向反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23. 钟晓慧、彭铭刚(2022):《养老还是养小: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社会学研究》,第4期。
24. 朱喜安、魏国栋(2015):《熵值法中无量纲化方法优良标准的探讨》,《统计与决策》,第2期。
25. Arpino B., Gómez-León M. (2020), Consequences on Depression of Combining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with Other Caregiving Roles. *Aging & Mental Health*. 24(8):1263-1270.
26. Barnett A.E. (2015), Adult Child Caregiver Health Trajectories and the Impact of Multiple Roles Over Time. *Research on Aging*. 37(3):227-252.
27. Cong Z., Silverstein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5(1):6-25.
28. Falkingham J., Evandrou M., Qin M., et al. (2020), Informal Care Provision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in China. *Ageing and Society*. 40(9):1978-2005.
29. Gilly M.C., Enis B.M. (1982), Recycling the Family Life Cycle: A Proposal for Redefinitio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9(1):271-276.
30. Grigoryeva A. (2017), Own Gender, Sibling's Gender, Parent's Gender: The Division of Elderly Parent Care among Adult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1):116-146.
31. Hammersmith A.M., Lin I.F. (2019), Evaluative and Experienced Well-Being of Caregivers of Parents and

Caregivers of Childre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4(2):339–352.

32. Härmäläinen H., Tanskanen A.O. (2021), ‘Sandwich Generation’: Generational Transfers towards Adult Chi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7(3):336–355.

33. Liu J., Chen F. (2022),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Patterns,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Adults in Mid and Later Life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44(7–8):545–559.

34. Miller D.A. (1981),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Adult Children of the Aging. *Social Work*. 26(5):419–423.

35.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How's life? 2013: Measuring Well-being*. Paris: OECD Publishing.

36. Radloff L.S. (1977),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3):385–401.

37. Sieber S.D. (1974), Toward a Theory of Role Accumu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4):567–578.

38. Xu H. (2019),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and Great-Grandparen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29:106–116.

The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Younger Elderly Providing Care for both 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Li Xiongjing Yang Lixiong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and balance, as well as role accumulation, this study utilizes a four-generation family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aged 60 to 75, referred to as the "younger elderly". Using panel data from the 2018–2020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and apply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and staged PSM–DID mod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s mental health. The marginal impact is greatest among those who provide only eldercare, smallest among those who care only for grandchildren, and intermediate for those who combine both role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affects mental health by reducing social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limiting participation in socio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ncreasing subjective feelings of aging. The study further finds that the receipt of pension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on mental health, alleviating adverse effect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active aging and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Keywords: The Younger Elderly; Role Accumulation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Squeeze; Mental Health

(责任编辑: 华 颖)